



中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观察报告 (2025)



出品 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

项目成员 邹力 孙孝文

数据平台 善择-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大数据平台

目 录

前言	2
第一部分：国内外生物多样性政策趋势	4
（一）全球治理体系进入深化实施新阶段	4
（二）以制度建设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5
（三）政策趋势要求企业实践向主动转变	8
第二部分：中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观察	10
观察一：制造业在系统性生物多样性管理上表现更为突出	10
观察二：生物多样性表现与ESG整体表现高度相关	11
观察三：企业呈现“评估驱动”与“项目驱动”两类路径	12
观察四：TNFD成为领先企业生物多样性管理的新标尺	13
观察五：多数企业实践仍处于“合规响应”阶段	13
观察六：不同行业依据其业务特性开展差异化保护行动	14
观察七：新能源业从“选址避让”到“生态增益”的战略演进	15
观察八：金融业以“价值链间接赋能”为核心特征	16
第三部分：中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典型案例	18
A类案例：避免和减少项目对周边生物多样性影响	18
B类案例：恢复和补偿项目所在地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22
C类案例：供应链转型	27
D类案例：公益投资与公共教育等	29
第四部分：中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的建议	32
附录：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简介	34

前言

生物多样性保护，正日益成为中国企业践行可持续发展、重塑核心竞争力的新焦点。与过往侧重于环境合规与风险缓解的传统责任范式不同，当前的企业参与更强调将生态价值创造深度融入商业战略与运营流程，实现从“减轻损害”到“主动增益”的范式转变。

这一转变，深植于宏阔的时代背景。2024至2025年，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从“昆蒙框架”共识走向全面履约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迈入系统化、工程化新阶段的深化之年。时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二十周年，这一引领中国发展方式深刻变革的指导思想，已凝聚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并具体投射于“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蓝图之中。与此同时，国内外政策、金融与披露标准的快速演进，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企业的运营环境、市场准入条件及价值评估体系。

在此背景下，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治理，已超越单纯回应监管要求的范畴，成为其应对物理与转型风险、把握绿色增长机遇、构筑长期韧性的战略必需。越来越多的领先企业，不再满足于零散的公益项目或底线合规，而是开始探索如何结合自身业务特性，通过系统性评估、技术创新、供应链转型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转化为驱动商业创新、提升品牌价值、赢得资本市场信任的新动能。

然而，整体观之，中国企业生物多样性实践仍面临挑战。多数企业的行动尚处于“合规响应”的初级阶段，与“战略主动”的领先者之间存在显著差距；专业能力不足、数据基底薄弱、评估体系断层等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如何将国际前沿框架与本土实践有效结合，亦是亟待探索的课题。

企业应如何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深远战略意义？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可采取哪些差异化路径有效参与？领先企业已提供了哪些值得借鉴的创新实践与系统化经验？

为回应上述问题，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立足数据调研与案例研究，撰写《中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观察报告（2025）》。报告旨在呈现当前中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状、特征与趋势，剖析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提炼可供参考的实践路径与战略建议。

我们期待以此报告为起点，与社会各界持续探讨生物多样性这一关乎地球生命支持系统与人类长远未来的核心议题，共同推动中国企业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从“责任担当”到“价值创造”的深刻转型，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企业力量。

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

2025年11月

第一部分：国内外生物多样性政策趋势

2024至2025年，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从“框架共识”走向“全面履约”的关键两年，也是中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从“边缘责任”转向“核心战略”的历史性拐点。这一转变，深植于中国自身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演进的内在逻辑。时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两山论”）提出20周年，这一引领中国发展范式深刻变革的哲学思想，已从区域性的实践探索升华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并集中体现于“建设美丽中国”这一宏伟国家目标之中。

在此背景下，《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的宏伟目标，与国内持续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同频共振，正通过一系列迅猛发展的国内外政策、标准与金融工具，深刻重塑着企业的运营环境、竞争格局和价值评估体系。

（一）全球治理体系进入深化实施新阶段

2024-2025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进入快速演进与深化实施的新阶段。在“昆蒙框架”的总体指引下，国际社会从规则制定、监管披露到资金机制等多个维度持续推进，形成了更加系统、具约束力的政策环境，对全球企业的经营与转型产生深远影响。

1. 全球框架从共识走向执行

自2022年“昆蒙框架”通过以来，其执行与落地成为近两年的核心议题。2024年于哥伦比亚卡利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16）首次将“自然向好”（Nature Positive）写入全球框架协议，并聚焦于解决框架落实中的关键瓶颈——资金机制与监测体系。根据会议披露的数据，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缺口高达每年7110亿美元，且现有资金中仍有37%流向损害生物多样性的项目，这种结构性矛盾推动国际社会形成两大共识：建立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机制，以及构建统一的自然风险评估框架。

在监测体系建设方面，COP16就规划、监测、报告和审查机制（PMRR）达成关键共识，为衡量框架进展提供了标准化路径。会议确定了监测框架的23个指标和4个长期目标，确保各国能够以统一方式跟踪进展，并将国家数据有效汇总至全球层面。同时，缔约方明确了将在COP17开展首次全球评估，并确立了吸纳非国家行为体参与报告的具体机制。这一监测框架的完善，标志着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正从共识构建转向可衡量、可追踪的执行阶段。

2. 国际监管与披露要求趋严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正经历从“框架倡导”到“技术倒逼”的转变，企业的信息披露义务逐步从自愿走向强制。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于2024年发布的《GRI 101：生物多样性》专项标准，标志着信息披露体系的重大突破，其细致程度远超此前标准，要求企业披露对生态系统的直接影响，该标准将于2026年正式生效。

另一方面，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SSB）正积极整合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TNFD）框架，表明自然资源已与气候变化一样，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领域。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24年12月，全球自愿披露自然相关信息的公司和金融机构总数已达517家，而中国企业占比不足3%，这一差距在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生效后更为凸显，对中国出口企业构成了实质性贸易壁垒。

3. 资金机制实现系统性转型

2024–2025年，国际生物多样性资金机制实现了从单一依赖公共资金向构建多层次、创新型融资生态系统的关键转型。这一转型体现在两个相辅相成的维度：一方面，专门性多边基金体系趋于完善，全球环境基金（GEF）下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GBFF）成为落实“昆蒙框架”的核心渠道。COP16续会正式启动的卡利基金开创性地专注于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惠益分享，并承诺将至少50%的资源投向原住民和地方社区，凸显了公平导向。中国设立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则通过国家驱动的无偿援助模式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

除了设立新的基金，国际社会也在融资机制和策略上寻求创新与突破。战略上，更新通过的2025–2030年资源动员战略核心在于推动各国改革乃至淘汰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补贴（目标是至2030年每年减少5000亿美元），从源头扭转损害性资金流。操作上，多元化金融工具（如以国家公园未来门票收入为抵押发行债券）与数字技术赋能（如“数字自然身份证”提升投资透明度）协同发力，有效动员私营资本。这一系列进展共同标志着，国际生物多样性融资已演进为一个公共与私人资本协同、传统赠款与创新金融工具并重的综合体系。

（二）以制度建设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中国作为“昆蒙框架”的倡导者和坚定履行者，在2024–2025年间持续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顶层设计与实施体系，通过战略规划、法律法规、重大工程等多维举措，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向系统化、法治化、工程化方向发展，为企业参与创造了更为明确的政策环境。

1. 政策体系加速完善

2024-2025年，中国密集出台多项关键政策，形成了覆盖战略规划、企业披露与技术标准的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进入系统化、规范化的发展新阶段。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于2024年正式发布实施，作为落实"昆蒙框架"的国家方案，该计划设定了清晰的保护目标与实施路径。计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使超过12%的退化生态系统得到有效恢复，并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纳入地方政绩考核体系，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了明确的行动指引。

在企业监管层面，2024年正式实施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试行）》要求上市公司强制披露生物多样性相关治理策略、风险识别及减缓措施。这一由沪深北交易所同步推出的披露标准，首次为企业生物多样性管理建立了统一的报告框架，推动企业将生态保护因素纳入经营决策全过程。

准则 / 要求	适用范围	强制性	重点议题（关键词）
《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	境内企业及外资企业	由财政部等九部门印发，具有权威性和规范性要求	目标规划、行动步骤、资源投入、生态修复、技术研发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试行）》	沪深北交易所上市公司	交易所实施，具有较强约束性	红线影响、功能区措施、数据成效、珍稀物种、生态空间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 - 2030 年）》	未明确严格界定，各类有影响力企业	未明确强制，但有政策推动压力	经营影响、污染排放、资源依赖、可持续性、周边生态
《GRI 101：生物多样性 2024》	未明确具体，面向公司层面	对采用其标准的企业有影响力	丧失驱动、土地利用、污染影响、社区生计、文化传统
《欧洲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	欧洲地区相关企业	在欧洲地区有较强约束性	种植模式、农药影响、生态依赖、气候风险、应对策略
《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框架》（TNFD）	未明确严格范围，各类企业可自愿采用	非强制，但市场影响力渐强	资源依赖、开采影响、财务风险、绿色机遇、价值评估
ISSB 生物多样性主题性准则研究项目	未明确具体，考虑不同司法管辖区情况	项目成果拟设基线标准，多数司法管辖区已有强制要求，未来准则可能具强约束性	指标差异、通用指标、数据收集、披露格式、信息可比

在技术规范领域，生态环境部于2025年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标准（试行）（征求意见稿）》，该标准建立了包含生态完整性、物种丰富度、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核心指标的评价体系，为重大工程项目的生态影响评估提供了科学依据，有效解决了以往评价标准不一、结果难以比较的技术难题。

这三项关键政策相互衔接、互为支撑，共同构建了从国家战略到企业执行、从宏观目标到技术评估的完整政策链条，标志着中国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的全面升级，为各领域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

2. 监管执法与空间保护强化

中国通过强化监管执法和扩大保护空间，持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在监管方面，持续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绿盾”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破坏生物多样性的违法行为，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重点核查内容。在保护空间体系方面，中国已建立34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总数位居亚洲第一，几乎涵盖了我国主要的生态系统类型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

截至2025年8月，国内已有214个自然保护地加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形成了全球实施“人与生物圈计划”最大规模的国家网络。此外，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进一步优化，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全面落实，共同构筑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空间基础。

3. 重大工程与系统治理扎实推进

中国创新性地采用工程化手段推进生物多样性系统保护，标志着治理模式从战略构想到系统落地的重要跃升。2025年初，生态环境部会同财政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方案（2025—2030年）》，提出七大工程、24个项目，旨在以工程化手段夯实生物多样性保护基础。

这七大工程包括“就地保护与生境修复”、“迁地保护与种质资源保护”、“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可持续利用”、“评估体系”、“协同工程”和“主流化工程”，系统构建了从监测评估、风险预警到恢复治理的全链条行动路径。该《实施方案》突出系统性、可操作性、引领性、融合性和国际化五大特征，首次将“协同增效”、“跨境保护”等理念纳入工程目标，体现了从生态价值向治理效能的延伸。

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七大领域

工程类别	核心内容	实施重点
就地保护与生境修复	优化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栖息地修复	国家公园和生态廊道建设
迁地保护与种质资源保护	加强植物园、种质资源库、救助繁育体系建设	遗传资源保育
生物安全风险防控	强化外来入侵物种、转基因生物和疫病疫病防控	全链条生物安全治理
可持续利用工程	推动生物资源惠益分享和生物多样性友好型产业发展	城市、乡村、企业多元主体参与
评估体系工程	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升级监管平台	陆海统筹、地空协同的智慧监测
协同工程	强化与气候变化和污染防治的融合	“污染-生物多样性-健康”协同防控
主流化工程	提升公众、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关注度与行动力	ESG信息披露、绿色供应链管理

（三）政策趋势要求企业实践向主动转变

国际国内生物多样性政策的快速发展与融合，对中国企业的经营理念、风险管理与发展战略产生深远影响，驱动企业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管理，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核心业务考量，以期在日益严格的监管环境与市场选择中获取竞争优势。

1. 信息披露要求趋严，倒逼企业完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体系

随着国内外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标准的逐步统一与强制化，中国企业面临日益增强的披露压力，亟需构建内部生物多样性管理能力。2024年沪深北交易所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要求特定上市公司披露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信息，标志着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从自愿走向规范。与此同时，GRI于2024年发布的《GRI 101：生物多样性》专项标准，要求企业全面且精准地披露生物多样性战略、政策、目标、绩效等多维度信息，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披露难度与管理成本。

然而，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的《企业生物多样性披露研究》显示，中国企业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整体尚处于探索阶段，该研究报告评价的188家A股上市企业中，仅15家（占比8%）明确提及了“生物多样性”关键词。这种差距反映出中国企业在生物多样性管理上面临的“数据迷雾”困境——多数企业仍停留在CSR层面的自发行动，尚未建立系统性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框架，暴露出专业人才储备不足、数据基底缺失、评估体系断层等结构性矛盾。

2. 贸易准入与供应链要求升级，推动企业绿色转型与创新

国际市场特别是欧盟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相关法规，正通过贸易链路传导至中国企业，重塑全球产业链的绿色标准与竞争格局。欧盟《自然恢复条例》已于2024年8月生效，该法规设定了具有约束力的目标，要求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并明确到2030年，成员国应在欧盟至少20%的陆地和海域面积实施恢复措施。此外，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虽然在其2025年提出的综合方案中有所简化（例如将强制披露的企业员工人数门槛从250人提高至1000人，适用范围预计缩减约80%），但符合条件的大型企业仍需根据《欧洲可持续报告准则》（ESRS）进行报告。

这些法规构建了严格的绿色贸易门槛，要求企业证明其产品未导致森林破坏或生态系统退化，对中国出口企业形成了实质性贸易壁垒。在供应链前端，企业需基于国际标准开展生物多样性风险评估，优先选择可持续认证的原材料供应商；在生产环节应引入动态监测机制，量化评估运营活动对生态系统的扰动，并建立生态修复补偿机制。

3. 政策体系持续完善，引导企业融入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格局

当前，多层次政策体系的构建正为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清晰的激励与约束，引导其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治理。

首先，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健全，正为企业创造“保护者受益”的市场化路径。2025年6月，财政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机制，并坚持“谁污染、谁治理，谁保护、谁受益”的原则。该意见设定了明确目标：到2027年，长江、黄河干流统一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将建成，并鼓励地方将补偿范围从水流拓展至森林、草原、湿地等多种生态环境要素。这为企业，尤其是那些位于生态节点或依赖特定生态资源的企业，通过参与生态修复和保护项目获得经济补偿提供了稳定的政策预期。

其次，标准与金融工具的细化，正降低企业参与的门槛并提升其积极性。政策层面正致力于解决企业参与过程中遇到的技术与融资瓶颈。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张蓓在2025年9月透露，由央行牵头制定的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已计划近期在“有能力、有意愿”的部分地区启动试用。与此同时，生态环境部的分析指出，超过60%的企业在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上存在困难，主因是缺乏专业的监测和评估方法。政策体系正通过明晰权责利、提供技术标准和创新融资渠道，共同引导和激励企业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深度融入其发展战略和日常运营。

第二部分：中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观察

本章节所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南方周末善择云平台，聚焦于中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及在华外资企业）在生物多样性议题上的政策规划、影响评估、项目实践、项目支持等维度。核心数据样本选取2025年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研综合得分前300名的企业，其中，制造业含177家，服务业含123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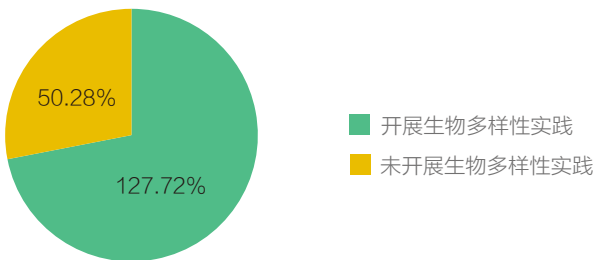
观察一：制造业在系统性生物多样性管理上表现更为突出

通过行业数据的对比可以发现，制造业企业在建立系统性的生物多样性管理体系方面明显领先于服务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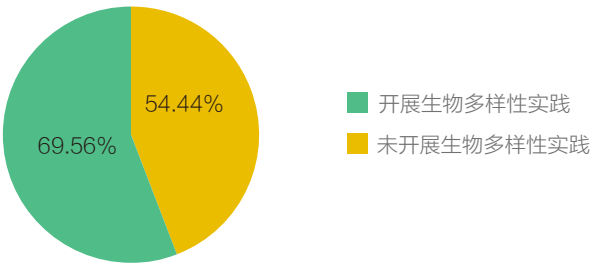
在制造业中，头部企业普遍展示了从评估到行动的完整链条。根据调研结果，吉利控股实现了“100%整车制造基地开展自然受益管理成熟度评价”，并联合中华环保联合会开展公益活动。阳光电源不仅进行公司新能源电站运营点及所涉及生态系统评估，更联合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启动了“阳光林”项目，为大熊猫栖息地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巴斯夫（中国）采用了IPBES定义的生物多样性丧失五大驱动因素框架进行分析，并展示了具体的项目案例。

反观服务业，虽然也不乏亮点，如蚂蚁集团设立了多个公益保护地，中国移动利用5G+AI技术监测鸟类，但更多企业的实践呈现“点状”或“间接”特征。金融机构（如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并未明确开展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估，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信贷政策的绿色导向上，属于价值链间接影响，而非对自身运营的直接系统性管理。

这种差异反映了制造业由于直接涉及资源使用、土地利用和排放，面临更直接的监管和自然环境压力，因此更早地启动了系统性的生物多样性管理。而服务业，特别是金融和科技企业，其影响更多是间接的，管理重点仍在探索阶段。



图：制造业调研企业开展生物多样性实践情况（单位：家）



图：服务业调研企业开展生物多样性实践情况（单位：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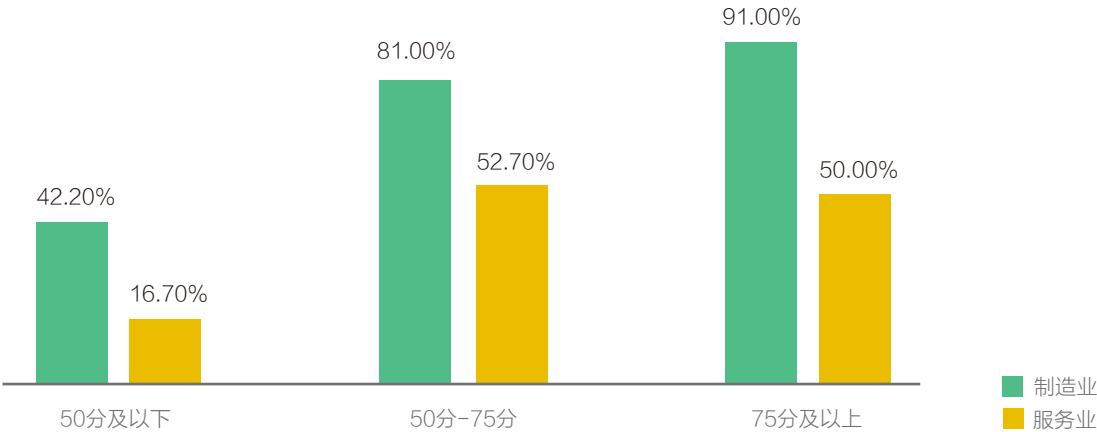
观察二：生物多样性表现与ESG整体表现高度相关

企业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表现与其ESG总分高度相关。在ESG总分领先的企业群体中，其生物多样性实践的深度和广度都明显更优。

在ESG总分高于75分的领先企业中，对生物多样性议题表现出系统性关注与实践。制造业的典型代表，如联想（84.31分）、吉利控股（83.44分）、阳光电源（80.88分）和工业富联（79.92分），均在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估或保护项目方面展现出明确且具体的行动。同样，在服务业中，腾讯控股（78.66分）、中国移动（76.08分）和蚂蚁集团（74.68分）这些为数不多的领先企业，也正是该行业中生物多样性实践最为突出的代表。

相比之下，ESG总分低于50分的企业群体，在生物多样性管理方面普遍存在明显短板。在这一区间内，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多数企业均未在生物多样性领域有任何实质性的信息披露或实践举措，反映出其环境治理体系的完整性有待加强。

这一趋势说明，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企业环境（E）绩效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直接贡献于其整体ESG表现，领先的ESG表现通常也要求企业在自然相关议题上展现出领导力。



图：调研企业各分数段生物多样性实践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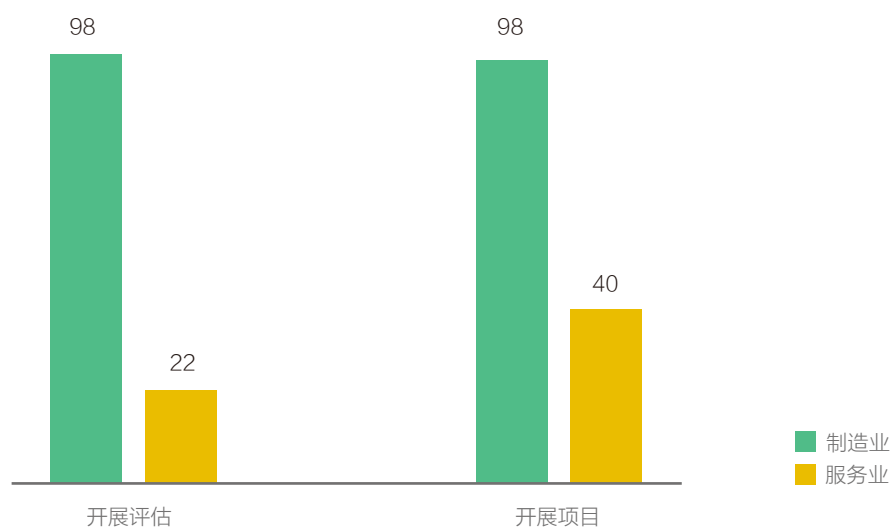
观察三：企业呈现“评估驱动”与“项目驱动”两类路径

根据企业披露的具体实践内容，其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参与路径可归纳为“评估驱动”与“项目驱动”两大典型模式，反映出企业在认知层次与战略定位上的显著差异。

评估驱动型企业将系统性评估作为首要环节，以此为基础构建管理策略，展现出较强的战略前瞻性与风险管控意识。例如，工业富联在开展自然相关依赖、影响、风险与机遇的全面识别后，计划于2025年正式加入TNFD；万科参考TNFD的LEAP方法论启动了首次自然风险评估，系统审视业务与自然的关联；百度也依据TNFD框架，首次对生物多样性议题进行了系统性评估。这类实践强调以数据与框架为依据，推动生物多样性管理向专业化、制度化方向发展。

项目驱动型企业则倾向于从具体保护行动入手，通过直观的生态修复或公益项目践行生物多样性承诺，其行动往往更具社会可见度，并与企业社会责任紧密结合。例如，亚太森博在长江码头开展鱼苗放流活动，一次性放流青鱼、草鱼等共1.5万条；贝壳通过“蓝海行动”累计修复红树林113.3亩，种植约26万株红树；同程旅行则推动红树林生态修复计划，同步提升公众环保意识。这类路径侧重于行动的及时性与传播效果，易于凝聚内外部共识。

值得关注的是，部分领先企业如宁德时代、阳光电源等，已不再局限于单一路径，而是将评估与项目有机融合，形成了“识别风险—制定策略—落地行动”的完整管理闭环。这种整合模式标志着企业生物多样性治理正从分散化、响应式实践，迈向系统化、战略级管理的新阶段。



图：调研企业生物多样性主要实践类型（单位：家）

观察四：TNFD成为领先企业生物多样性管理的新标尺

在披露生物多样性实践的企业中，一个显著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高分企业开始采纳国际先进的披露与评估框架，其中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NFD）的框架最为突出。这表明中国领先企业正积极与国际标准接轨，提升其环境管理的规范性和透明度。

在采纳TNFD框架的制造业企业中，已涌现出一批积极实践者，系统地将国际标准融入其生物多样性管理体系中。工业富联在开展TNFD相关评估工作基础上，计划于2025年3月正式成为该框架的支持机构；牧原股份通过引入TNFD的LEAP框架，构建了完整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机制；传音控股也参照同一框架，运用LEAP模型系统识别自然相关风险与机遇。

与此同时，服务业中也出现了一批TNFD的早期采纳者，展现出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前瞻性。中国银行作为首家加入TNFD的中资金融机构，具有重要的行业标杆意义；百度则依据TNFD框架建议，首次对生物多样性议题开展了系统性评估；而万科与越秀地产两家房地产企业，均参考TNFD的LEAP方法论启动了自然风险评估，显示出该框架在不同服务业态中的适用性正在扩展。

除了TNFD，其他国际工具也被广泛使用，如宁德时代使用IBAT（综合生物多样性评估工具），海天味业基于ENCORE、BIA、WRI-BRF等权威数据库进行分析。

这一现象说明，采用TNFD等国际框架已成为企业展示其在生物多样性治理上先进性的重要标志。它不仅是管理工具，更是一种声誉资本，有助于企业在全球供应链和资本市场中获得认可。

观察五：多数企业实践仍处于“合规响应”阶段

当前，中国企业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实践深度整体仍有待加强，尽管部分领军企业已展开战略性布局，但大多数企业的行动仍主要停留在“合规响应”的初级阶段。

在“合规响应”层面，企业普遍以遵守法律法规、规避生态红线及完成法定环评作为主要行动依据。例如，立讯精密强调“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开展经营活动”；金龙鱼在运营中“严格规避生态红线区、珍稀动物保护区”；中国国航则明确“依照《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开展工作”。这些实践体现了企业对基础法律义务的履行，但尚未展现出更主动的战略投入。

相比之下，少数企业已进入“战略主动”阶段，它们超越合规底线，将生物多样性深度融入企业战略，并采用国际先进工具与方法。宁德时代运用“生物多样性敏感地IBAT识别”进行评估；牧原股份引入TNFD的LEAP框架，系统建立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机制；TCL科技则制定专项保护政策，致力于实现“净积极影响”。这些实践显示出企业对自然相关风险的深刻认知与前瞻性管理意愿。

从整体数据分布来看，达到“战略主动级”的企业仍属少数，且多为各行业中ESG表现领先的头部企业。绝大多数公司仍处于以履行法定义务、规避环境风险为主要动机的起步阶段。这一格局表明，中国企业生物多样性实践要实现从“被动合规”到“主动创值”的全面转型，仍有较长的路径有待探索与推进。

表：调研企业生物多样性实践深度

实践深度层级	典型描述关键词	企业数量（占比）
战略主动级	TNFD、LEAP、IBAT、净积极影响（NPI）、自然正效益等	22（7.3%）
项目参与级	植树、放流、修复红树林、公益保护地、宣传教育等	54（18.0%）
合规响应级	遵守环保法、环评、规避生态红线等	91（30.3%）

观察六：不同行业依据其业务特性开展差异化保护行动

当前，中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正呈现出显著的行业分化特征。领先企业已不再满足于植树、放流等通用型公益活动，而是日益注重结合自身业务特性与环境足迹，开展具有高度行业识别度的保护行动，使其举措更具针对性与实际影响力。

在科技、互联网与电信服务领域，企业充分发挥其技术优势，推动“技术赋能型”保护模式。中国移动利用5G+AI与红外感应技术，实现对黄河湿地鸟类的实时监测；阿里巴巴通过淘宝天猫平台的人工智能算法，对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内容进行识别与拦截；顺丰控股则引入专业评估工具，系统性开展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估。这些实践体现了数字技术在现代生态治理中的创新应用。

制造业企业则致力于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业务全链条，特别是在选址、建设与运营环节落实生态修复。电池行业代表如宁德时代与赣锋锂业，在项目选址阶段即严格开展环境尽职调查，优先使用棕地，规避生态敏感区域，展现出对供应链上游风险的管控意识。而重工基建企业如三一重工、中国中车与中国交建，则在项目全周期实施环境敏感目标评估与生态动态监测，并在厂区范围内营造人工栖息地，实现生产与生态的协同发展。

地产业将生物多样性管理前置至规划与设计阶段，形成从选址到景观的一体化保护机制。招商蛇口通过制定专项政策，承诺规避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并开展生态增殖放流等补偿行动；中国金茂在项目开发中强调对自然栖息地的保留、原生植被的种植以及湿地的修复，体现其对生态友好型开发的追求。

食品饮料行业则聚焦于可持续供应链建设与原料产地栖息地保护。百胜中国公开承诺打造“零毁林”供应链，并发布《生物多样性声明》；伊利与蒙牛在牧场建设与运营中强化生物多样性管理，其中蒙牛更发布了中国乳业首份TNFD报告，引领行业信息披露与国际接轨。

这种基于行业特性所形成的差异化实践路径，反映出中国企业正在逐步超越被动合规与公益参与的传统角色，转而以“负责任的自然管理者”身份，重新审视并深入参与生物多样性治理。这一转变不仅提升了企业行动的战略价值，也为各行业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观察七：新能源业从“选址避让”到“生态增益”的战略演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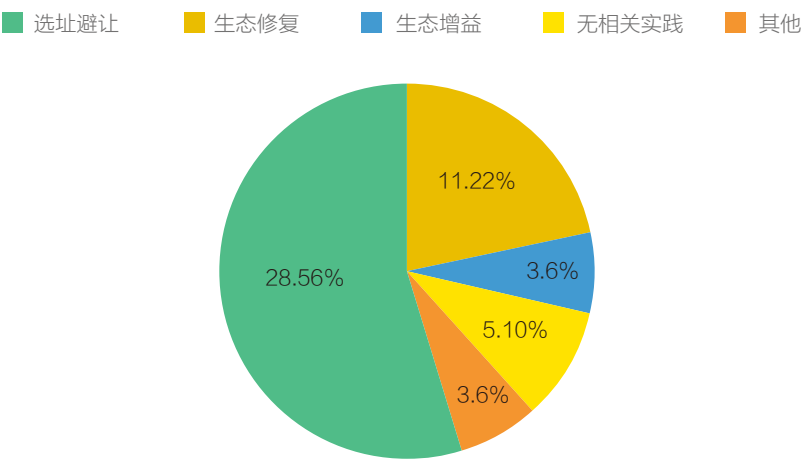
在本次调研所覆盖的各大行业中，新能源业在生物多样性政策制定及措施落地方面展现出最高的整体参与度与制度化水平，90.0%的新能源企业有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政策规划。与其他行业相比，该行业绝大多数企业不仅明确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承诺，更将相关要求系统融入企业制度和运营流程，形成了从“选址避让”到“生态增益”的清晰战略演进路径。

在初级阶段，企业普遍将“选址避让”作为生物多样性管理的基石，通过严格的选址评估体系规避生态敏感区域，从源头上控制负面影响。例如，欣旺达构建了完善的选址评估体系，坚决避免在自然保护区或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设立基地；国轩高科的项目选址均规避生态敏感区域与环境功能区保护目标；天赐材料明确其生产基地均设立于成熟工业园区内。这种“避让”策略是行业履行环保底线责任的基本表现。

在进阶阶段，领先企业已不满足于被动避让，而是通过“生态修复与补偿”主动对冲项目带来的残余影响。三峡能源在此领域表现尤为突出，投入超5亿元专项资金用于生态修复，累计修复退化生态系统超过4万公顷，将绿色投资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态效益。阳光电源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开发”理念，在项目全周期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了从规避损害到主动管理的跨越。

部分企业开始探索“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追求业务运营与生态系统的正向协同。正泰电器是这一路径的典型代表，其在光伏电站建设中植入“光伏+农业/渔业”模式，不仅避免了生态破坏，更创造了“清洁电力+农业生产”的双重收益，实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业务发展的融合共生。这种模式为新能源项目实现了“生态增益”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

新能源业凭借其与生俱来的绿色属性，不仅在政策制定上最为积极，更在实践中形成了层次分明、逐步深化的行动体系，为中国企业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从制度建设到战略演进的完整范本。



图：新能源业调研企业生物多样性实践类型（单位：家）

观察八：金融业以“价值链间接赋能”为核心特征

金融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分支，其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延续了服务业“间接影响”的整体特征，主要通过资金配置、风险管控等价值链环节赋能生态保护，而非对自身运营环节开展直接系统性管理，且银行、保险、证券等细分业态的实践重点呈现明显分化。

在银行业态中，头部机构的核心实践集中于“信贷政策绿色筛选”与“绿色金融产品供给”，通过资金流向引导实体行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大多数银行未明确开展自身运营的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估，但其通过制定专项信贷政策，优先支持林业、生态修复等友好型项目，同时限制对破坏栖息地、高环境风险行业的授信，形成“资金过滤”效应。

保险与证券业态则分别聚焦“风险保障”与“融资渠道拓展”，形成差异化补充。保险机构通过开发碳汇保险、生态修复保险等产品，为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提供风险对冲，例如部分机构借鉴“阳光林”“红树林修复”等项目的风险特征，设计针对生态修复工程的财产损失险与责任险，但此类产品仍处于试点阶段；证券机构则通过发行绿色债券、碳中和基金等，为自然保护区建设、生态廊道修复等项目募集资金，不过多数产品仅将“生物多样性”作为泛绿色主题的一部分，未形成专项聚焦。

表：金融业调研企业生物多样“间接赋能”实践类型

金融业态	“间接赋能”实践类型	企业数量（家）
银行业	信贷筛选、ESG挂钩贷款	18
保险业	碳汇保险、生态修复保险	10
证券业	绿色债券、生态主题基金	9

第三部分：中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典型案例

为系统展现中国企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积极探索与成效，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启动“中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典型案例”征集工作。本次征集聚焦企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创新实践与典型经验，旨在通过真实、具体的案例，呈现企业在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与成果，为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参考。

本次案例征集围绕四大类型展开：A类为“避免和减少项目对周边生物多样性影响”，强调企业在项目全周期中预防与减缓生态影响的实践；B类为“恢复和补偿项目所在地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关注企业在生态修复与功能提升方面的行动；C类为“供应链转型”，重点征集企业推动价值链整体绿色转型的系统性举措；D类为“其他”，包括公益投资、公共教育等拓展性实践。

A类案例：避免和减少项目对周边生物多样性影响

企业在项目全生命周期中主动采取措施，从源头避免或最大限度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是践行“预防为主”生态理念的重要体现。这类实践要求企业不仅要遵守环保法规，更要将生态保护意识融入企业文化和决策流程。通过科学规划、技术创新和精细化管理，企业能够在项目实施前就预见可能的生态影响，并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规避。这种前瞻性的保护策略，不仅体现了企业的环境责任，更展现了现代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智慧。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这类实践正成为衡量企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案例一：三峡集团——守护长江生命之河，构建全流域生态屏障

【案例背景及行动规划】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水电开发运营企业和中国领先的清洁能源集团，始终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清洁能源规划、设计、建设、运行全生命周期。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我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宝库，保护好长江流域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三峡集团要发挥好应有作用，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建设”，这为三峡集团深入开展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三峡集团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构建了完善的长江流域珍稀动植物保护体系。早在2007年就成立了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2008年接管了原中华鲟研究所，2022年整合成立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作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内设机构，以“改善流域生态系统现状，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为使命，重点围绕流域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开展应用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多年来，三峡集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集团坚持“关键技术买不来，重大问题等不起，唯有撸起袖子自己干，才能解决核心问题”的科技创新理念，围绕长江流域珍稀动植物保护的关键性、“卡脖子”技术持续开展科技攻关。从中华鲟的全人工繁殖技术突破，到圆口铜鱼等珍稀鱼类的人工繁育成功，再到珍稀植物的迁地保护和回归自然，三峡集团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企业在生态保护中的责任担当。

【具体措施及关键成果】

2024年，三峡集团在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在珍稀物种保护方面，全年放流各类长江珍稀特有鱼类超370万尾，其中中华鲟50万尾、长江鲟80万尾、圆口铜鱼100万尾、长鳍吻鮡28万尾，放流规模均创历史新高。这些放流活动不仅数量创新高，更重要的是在技术上实现了重大突破。通过DNA分子性别鉴定技术和遗传谱系管理，确保了放流个体的遗传多样性，为野生种群的恢复提供了优质资源。

在生态调度方面，2024年三峡集团继续深化梯级水库生态调度实践。自2011年首次开展生态调度以来，已经连续14年实施这一创新举措。2024年生态调度期间，长江宜都江段产漂流性卵鱼类繁殖规模达到686.9亿粒，其中四大家鱼繁殖规模约340.4亿粒，创2011年开展生态调度试验以来最高纪录。这一成果的取得，得益于三峡集团对四大家鱼产卵习性的深入研究。科研人员发现，四大家鱼需要在21–24℃的水温中，涨水幅度为1.5–3.5m的条件下进行产卵，且涨水幅度越大，产卵规模越大。基于这一发现，三峡集团通过精确的水库调度，成功制造出符合鱼类繁殖需求的“人造洪峰”。

在科研创新方面，2023年成功完成的世界首个八倍体动物基因组中华鲟的全基因组测序和组装成果，在2024年得到了深入应用。这项历时十年艰苦努力完成的突破性研究，为中华鲟遗传功能、种质保护和种群建设等研究提供了首个参考基因组，解决了长期因无参考基因组造成中华鲟研究在分子生物学水平分析的盲目性和随机性。2024年，科研人员基于这一成果，进一步开展了中华鲟遗传多样性评估、功能基因标记开发等工作，为中华鲟的保护提供了更加精准的科学依据。

在珍稀植物保护方面，2024年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继续推进植物迁地保护工作。目前，植物迁地保护种类已从2018年的560种增至2030种，保护苗木3万余株。团队在野外调查中发现了极小种群鄂西鼠李，并采取了有效的保护措施。同时，采集制作荷叶铁线蕨等珍稀资源植物标本5000余份，所有苗木在三峡坝区珍稀植物园内全部得到建档保护，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长江珍稀植物保育基地。

【对中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的启示】

企业应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至战略高度，纳入整体发展规划，并通过设立专门机构、配置专业团队确保工作的系统性和持续性。同时，科技创新是解决生态保护难题的关键，其在中华鲟保护、生态调度等领域的突破，均得益于持续的技术研发与科研投入。此外，企业应注重多方协作，联合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及社会组织形成保护合力。

实践证明，生态保护与企业发展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通过生态调度等措施，三峡集团在保护河流生态系统的同时，也优化了水库运行效率，实现了生态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这种“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值得所有企业借鉴。更重要的是，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长期坚持。唯有持之以恒，方能取得丰硕成果。

案例二：中国石化——以白鹭为鉴，打造重化工绿色转型样本

【案例背景及行动规划】

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从建厂之初就定下了“要保护好附近的舟山渔场，保护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发展基调，坚持凡是影响安全环保的事情一件不干、凡是牺牲安全环保的效益一分不要、凡是涉及安全环保的投资，不仅一分不省，而且按更高标准投入。这种深入骨髓的环保意识，为企业后续的生态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0年前后，化工“邻避效应”席卷全国，石化企业被贴上“不安全、不环保、不开放”的标签，甚至被“妖魔化”，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作为国资央企的标杆企业，镇海炼化深感责任重大，决心提高站位，当好绿色发展示范，打造企业与地方的命运共同体，给利益相关方带去更好的体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镇海炼化开始了以白鹭保护为特色的生态品牌建设之路。

2004年前后，镇海炼化厂区液化气装瓶站边上有一片小树林，春来秋回，自然形成了鹭鸟生息繁衍的栖息地。最初，这片小树林面积约2200平方米，与航煤储罐一路相隔。高峰时鹭鸟多达上千只，在装置上空飞翔，成为厂区一景。这些对生存环境极其敏感的白鹭，用自己的“选择”为企业的环保工作投下了信任票。镇海炼化创新提出“让白鹭告诉你”环保理念，让“白鹭”成为环保“代言人”，推动“无废无异味”绿色示范基地建设。

作为区域石化产业链的“链长”，中国石化镇海炼化高度重视培育企业绿色文化，率先打造绿色文化品牌，在带动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的同时，以I-egret（爱白鹭）绿色文化品牌引领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标准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实现区域环境生态的“共富”。

【具体措施及关键成果】

2024年，镇海炼化在生态保护方面继续深化，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果。2024年3月，镇海炼化白鹭园荣获“浙江省观鸟胜地”称号，成为中国首个不在自然景区的观鸟胜地。这一荣誉的获得，是对企业多年来生态保护工作的最好肯定。白鹭园从最初的2200平方米小树林，发展到如今15000平方米的生态园区，见证了企业生态保护理念的不断深化。

在生态保护设施方面，随着白鹭园改造工程的全面开展，新建的大型水体生态系统运行稳定，投放的本地野生鱼种实现了自然繁殖，为白鹭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拓展区对厂区塘下河、雨水沟的清污分流综合治理效果显著，辐射区通过厂区绿色管廊带连通石化区，河流、湿地、滩涂，形成了完整的生态网络。这些措施不仅改善了白鹭的栖息环境，也为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贡献。

与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的合作研究在2024年继续深入。通过卫星跟踪和环志技术，研究人员实时追踪白鹭的迁徙路径、觅食地以及繁殖活动，获得了丰富的生物学数据。这些数据不仅用于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为企业生态保护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研究发现，镇海炼化白鹭园已经成为区域性白鹭种群的重要栖息地，每年有数百只白鹭在这里繁衍生息。

I-egret白鹭全球慢直播平台在2024年持续运营，累计观看量已超过1亿人次。这个中国首个全景式白鹭全球慢直播平台，通过11路高清摄像头，全天候24小时直播白鹭原生态的筑巢、下蛋、孵化、破壳、哺育、飞翔全过程。平台不仅在国内受到欢迎，还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成为展示中国工业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2024年，平台进行了技术升级，画面质量和稳定性得到进一步提升，观众可以通过多个视窗，从不同角度观察白鹭的生活习性。

在公众教育和品牌建设方面，2024年镇海炼化继续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至今，公众开放日累计举办800余期，来自周边社区、中小学、高校、网络意见领袖、媒体、政府等25000余人次参观。

“环保设施对外开放”成为生态环境部优秀案例，白鹭园也成为中央企业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基地和中国石化十大红色教育基地的核心站点。

值得一提的是，镇海炼化在生态保护与文化建设融合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围绕“让白鹭告诉你”的环保文化理念，公司强化“白鹭”文化符号，开发了一系列环保文化周边产品。结合江南青瓷文化，公司开发的青瓷茶具小套件，杯体刻有“I-egret” LOGO，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这些文创产品不仅传播了环保理念，也成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对中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的启示】

镇海炼化的“爱白鹭”生态品牌实践为重化工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全新范式。企业通过白鹭这一对环境质量要求极高的“生态代言人”，将抽象环保理念具象化，以“让事实说话”的方式赢得公信力；同时以开放透明的姿态，通过公众开放日、全球慢直播等创新形式，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有效化解公众对重化工企业的“邻避效应”。这一实践表明，生态保护不仅可融入企业品牌建设，更能通过实实在在的投入（如管道改道增加300万元投资、施工避开繁殖期等）转化为品牌价值，实现生态效益与品牌提升的双赢。

更深远的意义在于，镇海炼化用实践证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能够和谐共生。通过将生态保护深度融入企业发展战略，重化工企业完全可以突破传统认知局限，成为生态保护的典范。这种将生态价值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创新路径，为整个行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彰显了新时代工业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智慧与担当。

B类案例：恢复和补偿项目所在地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企业在项目运营后对受影响的生态系统进行修复与补偿，是履行生态责任的关键环节。通过植被恢复、水土治理、物种重引入等措施，企业不仅能修复生态功能，还能提升区域生态服务价值，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案例三：南网储能——绿色能源工程与自然共生的创新实践

【案例背景及行动规划】

南方电网储能股份有限公司阳江抽水蓄能电站位于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八甲山区，是国家水电发展“十三五”规划“实现40万千瓦级、700米级超高水头、超大容量抽水蓄能机组设计制造自主化”依托项目，广东省重点建设工程。电站装机容量120万千瓦，安装3台40万千瓦抽水蓄能机组，2017年7月主体工程开工，2022年5月全面投产。电站对保障广东省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电网安全，促进阳江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消纳，助力实现国家“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

电站秉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在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一个超级“充电宝”的同时，致力于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电站提供一份阳蓄“样板”。电站紧邻广东省“植物王国”鹅凰嶂省级自然保护区，植物种类丰富，施工区域珍稀野生植物和古树名木的移栽保护、野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修复治理以及濒危物种保护公益项目的参与等，是电站建设运营过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实践，也是南网储能公司社会责任的展示和表达。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途径，电站紧邻的阳春鹅凰嶂自然保护区有维管植物超过1580种。电站建设运营中倡导全生命周期生态文明建设，通过珍稀植物移栽、生态环境修复、与自然保护区合作等方式，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生态多样性保护，有力促进现代化能源企业与周边自然环境的融合，打造工程与环境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电站。

在生态保护实践中，阳江抽水蓄能电站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工程管理办法》，制定生态修复专项方案。项目建设全过程始终锚定建设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工程总目标，紧扣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新要求。项目获评2023年度“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工程”，这一荣誉的获得标志着电站在生态保护方面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

【具体措施及关键成果】

2024年，阳江抽水蓄能电站在生态保护方面继续深化，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突破。在植被保护与恢复方面，电站持续推进与自然保护区的深度合作。特别是在珍稀植物保护方面，重点开展了猪血木回归实验，这项始于2023年的重要实验，将坝后20亩地用于猪血木回归实验种植，试验共移植猪血木2100株，监测数据显示，存活率继续保持在90%以上，这一成果为珍稀植物的异地保护提供了宝贵经验。

生态修复工程在持续推进，21万平方米施工现场恢复了“绿色外衣”。通过系统的植被恢复，20678株酸竹、绣球茜、金毛狗、华南锥等保护植物，以及榕树、龙眼、水翁等乡土树种已经重新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植物的生长情况超出了预期，形成了稳定的植物群落，为当地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在水土保持技术创新方面，电站继续优化柔性边坡治理技术。采用植生混凝土和三维网护坡技术，不仅增强了边坡的抗侵蚀能力，还促进了植被的自然恢复。雨水收集系统运行稳定，包括截排水沟和沉砂池在内的设施持续发挥作用，水质达标率连续三年保持100%。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电站对环保设施的精益管理和持续改进。

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维护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电站联合广东南粤生态科技公司，定期开展动植物种群动态监测，评估保护措施成效。同时在水库周边保留湿地与灌丛带，为鸟类和两栖动物提供栖息环境。电站优越的山林水域环境持续吸引大批白鹭栖息。这些被称为大自然“生态检测师”的白鹭，用自己的选择证明了电站生态环境的优良。

2024年，电站的生态效益也开始显现综合效应，累计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清洁电能23亿度，减排二氧化碳约180万吨。这些数据不仅体现了电站在能源保障方面的贡献，更彰显了其在绿色发展方面的示范意义。电站的成功经验已经开始推广至惠州中洞等抽蓄项目，形成了可复制的“规划-施工-修复”全链条生态保护模式。

【对中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的启示】

企业应将生态保护理念贯穿项目全生命周期，从规划阶段就前瞻性考量生态影响，在建设期采取有效措施，并在运营阶段持续开展生态修复，形成全过程生态管理闭环。同时，技术创新是生态保护的重要支撑，电站采用的植生混凝土、三维网护坡等创新技术，不仅解决了工程中的生态难题，更提升了保护效能。与专业机构合作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则确保了保护措施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这一实践充分证明，生态保护与企业发展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电站通过系统性生态保护，既履行了社会责任，也提升了企业形象，为后续项目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实现了生态价值向发展优势的转化。更重要的是，生态保护需要持之以恒的坚持——从项目初期的生态规划到运营阶段的持续修复，南网储能始终坚守生态优先原则。

案例四：江西铜业——重塑矿山生态，走绿色矿业发展之路

【案例背景及行动规划】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有色金属行业的领军企业，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绿色矿山”建设中，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矿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江西铜业充分认识到矿山生态修复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碳汇效应、社会价值的重要性，公司业务、员工、周边社区、供应链等整个价值链对生态系统和资源的依存性，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探索碳汇与生态修复新模式，以合理统筹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为目标，致力于构建节约高效、环境友好、矿地和谐的绿色矿业可持续发展模式。

作为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成员单位，江西铜业已将绿色矿山建设纳入战略规划。公司提出打造“绿色发展样板”的目标，大力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并通过构建源头减排、过程降耗、末端固碳“三位一体”管理模式，已经探索出一条独具矿山特色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公司按照评审备案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及土地复垦方案的要求，建立了责任机制和年度计划，每季度生产运营会议均要求各单位汇报绿色发展成果，并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确保绿色矿山建设持续优化和推广。

江西铜业严格遵循国家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水土保持、野生动植物保护、自然保护区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在自然保护区、生态敏感区及生态红线管控范围内进行任何勘查、开采和建设活动，重点关注矿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强化生态修复项目建设全生命周期中的生态环境管理。

【具体措施及关键成果】

2024年，江西铜业在绿色矿山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年投入生态修复资金1.2余亿元，新增修复面积108.21公顷，并做到了“连片成面”。这些修复区域不仅实现了高标准的植被恢复，还特别注重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恢复。修复区域内形成了多种植物匹配互长的生长态势，土壤中形成了健康的微生物群落，植物物种具备良好的生物多样性和观赏性。

在具体矿山的生态修复方面，2024年各矿山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德兴铜矿作为江西铜业的主力矿山，在生态修复技术应用方面继续引领创新。“原位基质改良+直接植被”复垦新技术在德兴铜矿得到大规模推广应用，这项荣获2019年度“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创新技术，成功克服了传统复垦技术的众多缺点，通过调控微生物群落抑制产酸，重建植被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原生态地貌。2024年，德兴铜矿西源岭生态修复基地已成功打造成生态公共产品——矿山生态景观公园，并在央视财经《正点财经》和新华网的新闻报道下，吸引了更多人一起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修复的场景和成果。

永平铜矿取得了重大突破，作为江西省唯一案例入选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全国首批15个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该矿支持的“无废城市”理念下的“无废矿山”建设持续推进，“智能+环保”项目成效显著。与北矿智云团队合作开发的“永铜智能管控平台”在2024年进一步完善，通过一张电子地图实现了对全矿地表环保设施设备集约监控；通过3D建模、在线测绘实现了库容曲线模拟和库容动态预报；通过无人机搭载激光雷达扫描设备和红外热成像分析设备，实现了对矿山生产区域及关联区域内各类要素的数字化监控。

武山铜矿围绕“建设国内标杆井采矿山”的目标，持续推进绿色矿山建设。通过开展“武山铜矿外排水软化工业应用关键技术研究”项目，采用离子交换法处理外排水并回用于生产，大大减少了南阳河新水的使用量，显著提高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率。2024年度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达到82.50%，体现了“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原则。

截至2024年底，江西铜业已有银山矿业、武山铜矿、城门山铜矿3家矿山获评国家级绿色矿山。这一成绩的取得，标志着江西铜业在绿色矿山建设方面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矿山的生态修复不仅注重技术效果，还特别关注与当地社区的融合发展。通过“修复一处矿山废弃地，打造一处矿山生态景点”的模式，江西铜业成功将生态修复与地方经济发展相结合，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体成效方面，2024年的监测数据显示，修复区域内的植物多样性显著提升。记录的植物种类包括草本植物类苎麻、狗牙根、宽叶雀稗、狗尾草、黑麦草、高羊茅、野菊花、金鸡菊、硫华菊、波斯菊、油菜等；灌木植物类刺槐、合欢、盐肤木、紫穗槐、红叶石楠、小叶女贞、木豆、田菁、胡枝子等固氮植物；乔木植物类大叶女贞、构树、臭椿、松树、樟树、桉树等。这种多层次的植被配置，不仅提高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还为当地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对中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的启示】

江西铜业的绿色矿山建设实践为矿业企业提供了系统性的生态保护启示。企业需将生态保护提升至战略核心，通过制定严格修复标准、完善管理制度，将绿色转型融入企业发展脉络。在实施层面，要注重技术创新与数字化赋能，其研发的“原位基质改良+直接植被”技术有效突破生态修复瓶颈，而智能管控平台、无人机监测等数字化手段则显著提升了保护效能，展现了科技驱动生态治理的现代路径。

这一实践同时证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可实现良性互促。通过打造矿山生态景观公园、发展工矿旅游，江西铜业成功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为资源型企业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范例。

C类案例：供应链转型

企业通过推动上下游供应链的系统性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企业整体价值链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这类实践要求企业不仅要管理自身的环境足迹，更要通过供应链管理将生态保护理念延伸到整个价值链。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的生态责任已经不再局限于厂区范围内，而是需要关注从原材料采购到产品消费的全过程环境影响。这种系统性的转型不仅有助于降低整体生态风险，还能推动整个行业的绿色发展。

案例五：城投老港——数字化赋能打造“公园城市”

【案例背景及行动规划】

上海城投集团打造的老港生态环保基地（以下简称“老港基地”）位于浦东新区老港镇东首，距上海市市中心约70公里，北靠国际空港（浦东国际机场），南邻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是原老港填埋场所在地的拓展和延伸。

基地始建于1985年，当时是为了解决上海中心城区面临的生活垃圾产量逐年增多而出路日益困难的问题决策兴建的。一直以来老港基地都倍受上海市委、市政府等各级领导的高度关注，期间经历过上海环卫事转企改革，从垃圾由分散简易堆放到集中填埋，再向无害化处置转变，到资源化利用，现在老港基地正向多元化、生态化、智慧化逐步迈进。

根据《上海老港生态环保基地规划》，2035年前，老港着力建成“智慧化绿色园区”。基地结合外围建设控制地带农林用地及南侧郊野公园的建设，共同形成良好的生态绿化环境。基地内考虑了生态湿地、堆土公园，森林公园等，总面积约100公顷；沿东海大道控制20米防护绿带、沿中央大道控制10米防护绿带，沿河道控制宽度不等的防护绿带，总面积约90公顷。

规划形成“两廊两带，五组团多节点”绿地系统结构，与基地南侧的郊野公园形成联动，提供多层次、多种类的生态休憩空间：

（1）两廊：结合中央大道、南北大道打造老港基地中央景观廊道。中央大道侧重核心景观窗口功能南北大道侧重生态防护分隔功能。

（2）两带：依托清运河、引清河打造围绕老港基地的生态景观间隔带。

（3）五组团：落实封场绿化区、生态控制区等控制要求，形成五大生态景观组团。

（4）多节点：聚焦园区内核心景观要素，打造森林公园、堆土公园、湿地公园等核心公园绿地。

【具体措施及关键成果】

在推进绿色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价值链绿色转型已成为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路径，其核心在于将生态价值融入产业全链条。老港基地的实践正体现了这一理念——通过生态碳汇建设与智慧平台构建，不仅系统提升了林地、湿地等生态空间，还以数字化手段优化资源调度与运营效率。与此同时，项目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通过科学调查识别物种分布与生态本底，强化栖息地营造和濒危物种保护，使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稳定性成为绿色转型的重要支撑。

推进基地绿化碳汇建设。老港基地结合公园城市理念，融合生态环保、工业旅游、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绿色融合发展先行示范区”，拟打造东海之畔的山林原野生态公园、上海都市循环经济绿色基地和国家环保工业旅游基地，将老港基地建成“山海田林河草滩”全生态要素的城市绿色融合发展示范区。

通过构建林野景观片区、山林景观片区、湿地景观片区和丘陵景观片区4大片区，2026年将由现有的557.12公顷增至750公顷左右。重点推动四期垃圾填埋场封场覆盖和绿化修复等一系列绿化建设，湿地景观片区设置探索栈道、鸟类观察所，营造鸟类生境。

推进老港基地数字化转型，构建基地数字地图。通过智慧物联，融合各处置厂核心管控数据，通过管理再造，构建基地场景化智慧运营管理体系，打造“智融合、惠管理”的基地智慧运营一体化管理平台，实现基地内各设施的指挥调度、预测分析、应急响应等功能，关键业务数据入库率100%。

通过系统AI模型实现策略与预案数字化、智能联动、运营优化等，实现一图总览老港基地的土地和厂房资源分布，提供老港生态环保基地物质、能量数据信息流和仿真推演，实现固废进厂和内部运营的智能调度和设施动态化运转，提高内外部协同和应急协同效率。

开展老港生态环保基地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工作。全面实施老港基地生物多样性调查和评估，包括陆生高等植物、淡水水生生物、哺乳动物、鸟类、鱼类、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等，摸清老港生物多样性本底，特别是珍稀濒危物种和重点保护物种的种类、分布等现状。识别濒危物种和外来入侵物种，提出针对性的保护和防控措施。提高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能力和管理水平，创新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机制。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和构建生态定位站点等监测网络，为建设老港工业生态旅游基地提供重要的生态保障。

2024年开展的生物多样性调查，调查人员共计179人，总计212个工作日，（野外调查+数据处理）共投入1052人次。完成调查样线76条，调查样方87个，调查记录表55张。本次调查发现2014至2024年间，老港基地林地面积增加了5.42km²，提升了35.61%。草地面积增加了0.68km²，提高了4.47%。

【对中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的启示】

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从局部治理转向全价值链的系统性管理。传统环保举措多聚焦于厂区内部的污染控制，而老港基地通过供应链绿色转型，将生态责任延伸至原材料、生产、处置等全生命周期。其打造的“山海田林河草滩”全生态要素示范区，以及通过智慧平台实现对能源、固废等物质流的精准调度，生动诠释了如何通过产业链协同降低整体生态足迹。

老港基地的实践凸显了科技赋能与数据驱动在生态保护中的核心地位。基地通过构建数字孪生平台，融合AI模型与物联网数据，实现了生态系统的可观测、可模拟与可预警。生物多样性保护不能仅凭经验与定性判断，而应积极引入遥感监测、基因测序、大数据分析等科技手段，建立企业专属的“生态资产账户”。通过量化生态效益、追踪物种动态，企业不仅能优化保护措施，也能向投资者、监管机构与公众展示可验证的环保成效，从而提升品牌公信力与可持续竞争力。

D类案例：公益投资与公共教育等

企业通过公益投资、科普教育、跨界合作等方式，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公众意识提升。这类实践不仅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还为社会生态治理注入新动力。与直接的环境管理不同，这类实践更注重通过知识传播、能力建设和社会动员，推动形成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共识和集体行动。

案例六：赛得利——守护“长江之肾”，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典范

【案例背景及行动规划】

赛得利集团作为全球领先的纤维素纤维生产商，与国际环保组织保护国际基金会（CI）于2019年合作启动“鄱阳湖淡水健康与湿地保护项目”。鄱阳湖位于江西省北部，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在水资源调节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具有全球意义。雨季时湖面可达约4000平方公里，枯水季则露出大片草洲滩涂，每年向长江输送逾1400亿立方米淡水，承担中下游防洪和供水重任。

鄱阳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最重要的越冬地之一，超过27种水鸟种群数量占全球1%以上，其中14种为濒危物种；全球95%以上的白鹤在此越冬。湖区也是长江江豚等珍稀淡水物种的重要栖息地，估计约40%的长江江豚栖息于此。独特的水文和生态价值使鄱阳湖流域的两处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然而，经济发展带来的土地开垦、水污染等威胁正日益加剧，气候变化导致水位异常起伏，严重影响候鸟栖息地并威胁周边社区饮水安全。这些生态威胁背后反映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管理障碍，包括：对湖区现有及潜在栖息地缺乏科学认知、当地社区和决策者缺乏湿地与野生动植物保护意识、重要自然保护区管理能力和资金不足、社区生计过度依赖渔猎导致过度开采和非法狩猎，以及本地环保社会组织数量少且影响力有限。

基于此现实背景，提升鄱阳湖流域生态治理能力、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势在必行。项目得到江西省林业局支持，并指定其下属的江西省自然保护区建设中心为合作窗口单位。项目总体目标是维护鄱阳湖生态系统健康，增强其对人类福祉的生态系统服务，并保护濒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

【具体措施及关键成果】

2024年，赛得利与保护国际基金会启动了鄱阳湖生态保护项目第三阶段（2024-2027）。这一阶段以“保护—恢复—共管—共融”为核心理念，聚焦于生态系统修复、生物多样性监测、社区可持续发展及创新生态金融机制的全面提升。第三期项目在总结前两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加系统、全面的保护策略。

在生态保护层面，项目计划通过建立“OECM（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试点，新增4730公顷保护地面积，并继续支持长江江豚、中华秋沙鸭等重点物种的栖息地识别与保护管理。这一创新性的保护模式，突破了传统保护地的界限，通过识别和管理那些虽然未被划定为正式保护地，但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区域，有效扩大了保护范围。

项目将利用自然基础解决方案，在10个社区开展污水处理与净水湿地示范工程，打造“净水社区”。这些工程不仅能够改善水质，还将为候鸟和其他水生生物提供更好的栖息环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措施在设计上充分考虑了当地社区的需求，力求实现生态效益与社区发展的统一。

在社区共管方面，项目将推广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融合模式，构建如“东方白鹳保护与水稻共生”“芡实种植与水雉保护”等生态生产实践。这些创新性的实践，将生态保护与农业生产有机结合，既保护了物种栖息地，又为社区提供了可持续的生计来源。例如，“东方白鹳保护与水稻共生”模式，通过在稻田中保留一定的生态空间，为东方白鹳提供了觅食和栖息场所，同时这种生态友好的农产品也能获得更好的市场认可。

项目还同步开发湿地碳汇方法学，探索碳融资与保护金融路径。这一创新性的尝试，旨在通过市场机制为湿地保护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持。通过量化湿地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并将其纳入碳交易体系，可以为湿地保护开辟新的资金来源，同时也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

此外，项目将支持省级自然教育总体规划，开发系统性的课程与传播内容，在更大范围内提升公众对生态保护的参与度和意识。目标至2027年，项目覆盖人群达250万人次，形成企业、政府、社区和科研协作的长期共治机制。这些教育活动的开展，不仅传播了生态保护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和参与能力。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赛得利特别注意了与各相关方的协作。公司与保护国际基金会的专业团队密切配合，与地方政府部门保持良好沟通，与当地社区建立互信关系，与科研机构开展深度合作。这种多方协作的模式，确保了项目的顺利实施和长期可持续性。

【对中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的启示】

赛得利鄱阳湖保护项目的实践为企业的公益环保投入提供了启示。通过与保护国际基金会的专业合作，企业有效弥补了生态保护领域的专业短板，实现了资金资源与技术管理的优势互补。持续六年的长期投入确保了项目的持续推进和深度发展，而淡水健康指数（FHI）等科学评估工具的应用，则为保护工作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

该项目同时证明，社区参与是实现生态保护可持续性的关键。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推广生态农业等举措，项目成功帮助当地社区从保护中获益，极大提升了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这种将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深度融合的模式，不仅为赛得利赢得了良好社会声誉，更通过培养员工环保意识、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实现了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有机统一，为其他企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式。

第四部分：中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的建议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和自然资源的主要利用者，中国企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治理，已不仅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更是关乎自身运营安全、规避生态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战略。面对从国际到国内日益增强的监管压力和公众期待，企业主动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长期发展规划，是应对未来挑战、把握绿色机遇的必然选择。

一是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深度融入企业核心战略与运营流程。企业需超越将生物多样性视为孤立环保项目的局限，将其提升至企业战略与治理的核心层级。这意味着企业应在董事会层面确立明确的责任机制，将生物多样性目标纳入公司长期发展规划，并建立跨部门的协同管理架构。在具体运营中，应开展全面的生物多样性影响与依赖评估，识别供应链、生产流程及产品生命周期中各环节对生态系统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例如，农业企业可致力于减少农药使用以保护授粉昆虫，制造业则需严格管理水资源取用与污染排放。通过将生物多样性考量嵌入投资决策、生产标准及采购政策，企业能够系统性降低生态风险，并从中发现新的商业机遇，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发展。

二是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机制，积极回应国际披露框架。面对全球范围内日益强化的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要求，中国企业应主动适应并引领这一趋势。当前，国际社会正推动建立类似气候相关财务披露（TCFD）的自然相关财务披露（TNFD）框架，投资者、监管机构和公众对企业生态足迹的关注度持续提升。企业应未雨绸缪，开始系统性地收集、整理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数据，包括其对土地、水资源利用的变化，以及对特定物种的影响等。在信息披露方面，应努力提高透明度，参照国内外主流标准进行披露，这不仅能展现企业的责任担当，有效管理相关风险，更能吸引重视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投资，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声誉与竞争力。

三是依托科技创新与应用，推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在企业运营中的实践。科技创新是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挑战的关键力量。企业应积极探索并投资于那些能够减缓甚至扭转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的技术与商业模式。这包括开发和采用环境友好型材料、清洁生产技术，以及利用数字化工具如卫星遥感、无人机和人工智能进行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估。例如，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可采用“生态植草沟”等绿色替代方案来管理雨水，既增强自然净化能力，也为野生动植物提供栖息地。通过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融入价值链，企业不仅能有效减少自身的生态足迹，更能创造积极的生态效益，实现从“减少损害”到“主动修复”的转变。

四是加强多方协作，构建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单一企业的力量有限，必须依靠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合作。企业应主动寻求与政府部门、科研机构、行业协会、本地社区及环保非政府组织（NGO）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通过参与行业倡议，企业可以共享知识、经验与资源，共同应对行业性的挑战。在具体项目中，与生态学专家及本地社区合作，能确保保护措施的科学性和社区可接受性，例如在矿山生态修复中采用乡土物种进行植被恢复。这种跨界协作有助于企业规避“漂绿”风险，确保其保护行动产生真实、可衡量的积极影响，共同汇聚成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强大合力。

五是利用数据库（平台）赋能企业的可持续竞争力。首先，企业可借此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风控，通过前瞻性识别生态敏感区与行业共性风险，从源头规避项目停摆与监管处罚，实现从“亡羊补牢”到“未雨绸缪”的转变。其次，良好的生物多样性评级如同企业的“绿色体检报告”，能有效吸引ESG投资，降低融资成本，提升资本市场竞争力。再次，依托数据库生成符合国际标准的鉴证报告，有助于企业塑造负责任的品牌形象，突破绿色贸易壁垒，深化全球供应链合作。最后，数据库的价值更升维至战略决策层面，通过系统评估企业对自然的依赖与影响，启发开发自然友好型产品、投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从而在绿色经济中抢占未来制高点。

附录：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简介

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成立于2008年，是隶属于南方周末报社并由其发起的专业研究机构。其宗旨是：利用南方周末作为全国布局的综合新闻媒体优势，发挥媒体的整合和实践能力，联合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优秀学者、专家、企业及社会组织从业人士，积极推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在中国当下情境的研究和实践。

作为南方周末报社倾力打造的媒体智库之一，研究中心立足南方周末的品牌调性与资源优势，创新媒体智库产品和服务形态，研发推出了一批新型产品和服务，包括政策咨询、调研榜单、高端论坛、第三方评估、专题研讨、报告专著等，为政府、行业商协会、企业等部门提供了高品质、专业化、特色型的智慧服务，建立起了南方周末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独特而强大的专业影响力。

组织与平台

研究中心目前有专职研究人员12人，分布于广州、北京、上海和成都。此外，还搭建了外部专家平台：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智库”：是研究中心发起的平台型组织，目前拥有70多名专家，成员来自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组织、企业、基金会等机构的优秀从业人员。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智库——碳中和专业委员会”：作为媒体智库，碳中和专委会将始终立足媒体定位，结合南方周末在企业社会责任、绿色新闻报道中的专业能力，对碳中和领域的热点议题和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观察，输出专家观点和研究成果；同时，通过文章、观察报告、绿色论坛、案例研究等形式，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

政策咨询

作为媒体智库，研究中心积极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合作，为其提供政策调研、政策咨询、经验模式总结等服务。

责任调研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评选已持续开展22年。2003年，南方周末联合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暨南大学等机构研发完成最初的评价指标，并推出“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调研以企业主动公开信息、政府部门登记信息及第三方调研数据等科学、客观的资料作为研究基础，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状况作出综合研究与评估，是同类媒体评选中发起最早、操作时间最长、调研数据最庞大的企业社会责任调研。

2018年，研究中心全面完善企业社会责任调研，更新已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首次将不同经济所有制的企业一起评价，重点跟踪代表性大型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每年调研样本覆盖企业超600家。

社会责任月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是由南方周末报社主办的成果发布会，发起于2009年，至今已举办十六届。该活动旨在通过年度责任活动，探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有责任担当的组织或个人应遵循的道路，梳理年度责任标杆人物和案例。

社会责任月系列活动是以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为核心，ESG生态共建主题活动、互联网行业社会责任成果发布会等主题活动为扩展的年度系列活动。2024社会责任月系列活动吸引来自政府、国际组织、企业、机构等共60位代表登台开讲，现场发布10份报告/研究成果，年会传播期间共有超过80家媒体的传播支持，线上视频直播观看人数累计约280万人次，媒体曝光量累计过10亿+。

专题研讨

依托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智库以及南方周末在社会责任、ESG领域积累的资源优势，2019年，研究中心发起“CSR思享荟”专题研讨会。研讨会聚焦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通过“专家集体咨询”的方式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建言献策。目前，“CSR思享荟”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苏州、宜宾等地举办25期，参与人员超过900人。

报告专著

自2003年以来，研究中心共发布年度CSR观察报告（蓝皮书）、行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特定议题研究报告、前沿议题研究报告等报告40余本；公开出版了《在一起——中国留守儿童报告》《中国扶贫的企业样本》等专著。

标准制定

研究中心积极将研究成果、知识经验转化为公共产品，承担、参与多起团体标准制定工作。2020年，发起主编《慈善组织新闻发布指南》，2022年发起主编《零碳社区建设与评价指南》，2025年发起主编《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评价机构规范》。此外，研究中心还积极参与了《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评价指南》《互联网企业ESG评估指南》等多项团体标准的编写工作。